

国民党

在大陆和台湾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中国国民党的产生

中国国民党的产生，可分为五个时期。1894年11月，孙中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8月，在几个革命团体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因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分化，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四个小党，成立了国民党。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暗杀，国民党人被迫举行“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孙中山逃亡到日本，1914年7月创建中华革命党。由于斗争方式不适应革命发展需要，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这就是中国国民党的产生过程。

内忧外患 瓜分豆剖

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的。中国的政党，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19世纪中叶的清朝，已是“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火将尽”。在清朝的封建统治下，政治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民不聊生。封建统治者视国家为儿戏，纵情肆欲，鱼肉百姓。罄全国人民之脂膏，不足供宫室之挥霍，敲干掠尽，不敷贵族之淫乐。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遍地蜂起。军备废弛，文恬武嬉，经济技术落后，民穷帑尽。大兴文字狱的文化专制主义，钳制了人们的言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闭关锁国的政策，堵塞了中国人民的耳目，遮蔽了中国人民的眼界，也助长了清朝统治者的盲目自大。国土虽大，遍地狼烟；人虽众多，万马齐喑。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崛起，从1840年起，开始了对中国的野蛮入侵，发动了一次次侵略战争。每一次中国都被打败，其结果是割地、赔款，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签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国的主权出卖殆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所谓“天朝上国”跌进了尘世地狱。这些不平等条约象绳索，捆绑着中华民族这个巨人的躯体；一个个通商口岸象吸管，吮吸着这个巨人的膏血。鸦片的输入，毒害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商品的倾销，断绝了中国人民的生计，到处是饥馑和灾难。到19世纪末由于国势的衰弱，外力的进逼，瓜分之祸、亡国之险就在眼前。“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为虎作伥，残酷镇

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其作用仅在“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因此中国人民要挽救民族危亡，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奔走呼号 致力革命

孙中山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于1866年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

孙中山出世前后，家境窘迫。全家七口人居住在村边一间简陋的小砖屋里，靠租种两亩半田为生，他父亲孙达成还兼作村中更夫以维持家计。孙中山的童年，备受艰辛，他目睹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村的黑暗和落后。幼年的遭遇使孙中山始终对农民抱着极大的同情。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期这样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

孙中山从十岁始入村塾读书，按照传统的方式接受文化教育。哥哥孙眉于1871年去檀香山谋生。开始当雇工，后去茂宜岛垦荒，由自耕进而雇佣工人，开办商店和牧场，成为华侨资本家。随着孙眉经济地位的变化，翠亨村孙家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1878年5月，孙中山离开故乡赴檀香山依孙眉生活。离国远行开拓了这个少年的眼界，他“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从1879年到1882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学习了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1883年秋，孙中山返回香山，他根据国外所见，在家乡试行改良乡政。同年11月，孙中山到香港读书。1884年，法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深深刺激了孙中山。他更加痛恨腐败投降的清政府，他说：“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孙中山加紧探求挽救祖国危亡之路。

1886年夏，孙中山入医学院学医，直到1892年7月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校五年多的时间，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为全校之冠。在必修课之外，他贪婪地研读西方的历史、政治、军事等各类书籍，发表改革中国政治的言论，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经常和杨鹤龄、陈少白、尤列聚会，高谈阔论，兴高采烈，人们称之为“四大寇”。与“四大寇”交往密切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孙中山在幼年曾听过村中老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反清起义的业绩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时他不断谈起对洪秀全事业的向往，称洪秀全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朋友们戏呼他为“洪秀全第二”，他也欣然自命。

获医科硕士学位的孙中山，1892年秋以后，先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和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一起，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1893年冬，孙中山与友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他提议“吾人既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应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是为兴中会创立之第一声。但这个以反清

为宗旨的团体没有组织起来。

1893年12月，孙中山断然弃医，开始了从治病救人的医生到匡世救国的斗士的转变。他回翠亨村草拟了上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书稿，希望通过这位封疆大吏使中国的政治有所改良。1894年2月，孙中山和陆皓东北上投书，并借机观察清朝统治腹心地区的局势。孙中山在书中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书呈上去，如石沉大海，孙中山的希望落空了。上书的失败，给孙中山以极大的教训，他“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们由天津去北京等地游历，然后返回上海。在京津所看到的政治上的腐败和地方一样，当时中日战事激烈，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供其享乐。实地考察坚定了孙中山革命的决心，只有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此后，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酝酿成立革命团体。

当时檀香山约有华侨2万人，他们多靠种田地、辟蔗园、经营商业为生。多数侨胞安于现状，把孙中山的反清宣传视为“作乱谋反言论”，害怕招致“破家灭族”之祸，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是这种遭遇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他奔走逾月，终于获得了一些人的积极响应。

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召集赞成其主张的侨胞20余人，在檀香山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中召开成立团体大会。孙中山提议将团体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了他所起草的章程，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大家推举刘祥（永和泰杂货店

司理) 和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 程蔚南 (商人) 和许直臣 (教员) 为正副文案, 黄华恢 (永和泰号司事) 为管库, 李昌 (当地政府译员)、邓荫南 (农场主) 等八人为值理。随后, 孙中山让会员们填写盟书, 由孙中山领誓, 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宣誓人各以左手置圣经上, 高举右手, 向天次第读之。誓词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 某某, 驱除鞑虏, 恢复中国, 创立合众政府, 倘有二心, 神明鉴察。”

檀香山兴中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 为了救民于水火, 解民于倒悬, 经历了千辛万苦, 向西方学习。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以前, 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到以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 都是在保持清朝封建统治的前提下, 希望清政府做一定的政治改良, 而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 一开始就从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入手, 走上了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迥然不同的道路。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 孙中山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教练兵操, 筹饷募捐, 于1894年底归国筹备起义。

1895年1月, 孙中山到香港, 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等人商议, 联合革命同志, 扩大兴中会组织。2月21日, 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 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 集中全部力量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2月下旬, 孙中山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到广州, 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 会员迅速发展数百人。孙中山还组织了一个公开团体, 叫农学会, 借以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决定在1895年的重阳节举行起义, 但因谋事不密, 陆皓东等5人被

捕，起义计划全遭破坏。

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庭上英勇不屈，他怒斥清朝腐败，对从事反清斗争，直认不讳，受到了钉手足、凿齿等酷刑。陆皓东在供词中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他与会党领袖丘四、朱贵全同被杀害，孙中山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也”。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16人被清朝官府悬赏通缉。孙中山脱险至香港，经横滨，断发改装，重游檀岛。他联络革命同志，筹款支援国内起义，开始了在国外16年之久的逃亡生活。清政府的镇压，使广州和香港兴中会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又在横滨、南非、台湾、旧金山建立了分会，在东京青山设立军事学校。以兴中会为结合中心的革命党人达325人之多。并在1900年举行了惠州起义，又遭失败，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受到国内外的注视。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亡经过日本时，日本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孙中山从此成了著名的革命领袖。

东京集会 结党“同盟”

第一次广州起义后，孙中山所点燃的反清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起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殖民地化；德国攫取胶州，引起了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更为加深。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拒绝

政治上的任何改良，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北京菜市口，也沃肥了反清革命的土壤。《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个变成了外国利益看护人的王朝，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而对清朝统治者威胁最大的是新的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抗斗争。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办学堂和出国留学风气盛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群。自1900年始，张之洞和其他总督派青年人去日本和欧美留学，清政府企图用外国的科学知识来挽救它的灭亡。事与愿违，虽有的青年只是为寻谋生的出路，但更多的青年变成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反清斗士。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从1900年的100人迅速增加到1906年的8000人以上，东京成了革命青年的荟萃之地。

1903年后，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在日本和国内出版了大批书报杂志，与保皇党进行斗争，宣传反清革命和民主思想，激励人们争先恐后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同时他们在各地组织了一些反清革命的小团体，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它们的宗旨和兴中会一样，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比较突出的有：

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

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

1904年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伯亚、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

1904年冬，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领导的川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在上海建立的光复会。

此外，还有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它们各自汇聚着一股反清力量，为推翻清王朝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团体，活动范围仅限于一省或数省，相互联系薄弱，又明显受到民间会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影响，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没有达到完全的政治团体的规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任务的解决，终于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

孙中山在欧洲了解到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他把留欧学生近60人组织为革命团体后，1905年7月19日抵日本横滨，要在日本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很快前往东京，与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接触。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两位反清革命领袖见了面。随后程家桢又邀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与孙中山会商组织革命团体问题。

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改家里即黑龙会本部，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的问题。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冯自由、胡毅生、宋教仁、马君武、朱执信、古应芬、汪兆铭等70余人，除孙中山、黄兴等已经成为职业革命者外，大部分是在校的留学生。据冯自由记述，这天到会的包括中国本部18个省的17省人，只甘肃一省尚未有留学生在日本，故无人参加。其中曾参加过小团体者：兴中会2人，军国民教育会10人，青山军事学校2人，华兴会9人，科学补习所4人，光复会1人。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参加了会议。

首先孙中山向大家讲了革命形势，他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得到一致赞成。与会者皆签名。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有人提出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立共和国，因此以叫“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人们认为，使用“革命”字样，对这个秘密组织的活动不利，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有数人对“平均地权”提出异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作了详细解释，论述了世界革命趋势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他说：“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经解释后，虽仍有少数人持保留态度，但终获通过作为同盟会的宗旨。

孙中山即席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制定出誓词如下：“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与会者纷纷缮写签署盟书，再入隔壁房间由孙中山领导，同举右手向天宣誓，然后教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当场宣誓入会者达63人，孙中山亦自填誓词后交黄兴保管。宣誓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又推举黄兴、陈天华、汪兆铭等起草会章，待成立会时提出讨论。

经过20天的筹备，8月20日，100多名青年聚集在东京

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友人坂本金弥的住宅内，由孙中山主持，举行了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章程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确定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总理为同盟会最高领导人。随即选举总理及本部各机构的职员。黄兴提议：公议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投票选举，大家举手同意，其余按会章票选。会章规定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构，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它的负责人“庶务”可代行总理的一切职权。会上选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章程规定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分别推定了各省区主盟人，负责本省留学生入会主盟事务，并派人回国活动。

同盟会是按西方政党形式组织的，从此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孙中山后来曾这样论述同盟会成立的重大意义：“自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中国前途诚有望矣。”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的有系统的组织，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就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同盟会一方面展开了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一方面在南方举行了10余次武装起义。论战的胜利，使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历次起义虽不成，但各省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为武昌起义和清朝的覆灭创造了前提。同盟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枢，同盟会员为实现三民主义而流之血遍洒神州大

地。不过同盟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许多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组织的革命政党，参加的成员在政治态度上并不一致，组织也相当松懈。如光复会的不少成员参加了同盟会，但仍然保持了光复会的独立系统，并继续发展组织。许多分支机构长期各自为战，不少活动是个人自发搞起来的，步调很难一致，这就隐伏着日后在政治上、组织上分裂的因素。

“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火红的枪弹，划破了黑云低压的夜空，起义的怒吼，宣告了清朝末日的来临。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掌握了政权。但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革命的成果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清帝退位，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大功告成，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失去了一致斗争的目标。革命党内派系之间的分歧与争夺权力的斗争尖锐起来，组织涣散，行动不一，逐渐趋于分化瓦解状态。“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同盟会陷入一片混乱。

首先是革命宿将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回国，黄兴、谭人凤等电询他对于扩大革命的意见，他回复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

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认为在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不应再有政党存在，正式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后来旧官僚、立宪派纷纷借用这个口号，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施加压力，要求“销去党名”，实际上是要革命党人放下武装，拱手交出革命果实。而章太炎这么说也这么做，他既卷起了光复会的旗帜，又脱离了同盟会。与此同时，湖北的孙武、刘成昌等革命党人，热衷权势，纠集一批失意党人和官僚政客，拥戴黎元洪为首领，成立了“民社”。“民社”成为反孙倒黄拥袁的主要政党之一。

同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一些趋炎附势者，由反对革命变为赞成革命，大批旧官僚、政客加入了同盟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广西独立，以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的身份回到梧州的刘岷在回忆中写道：“这时我开始大量吸收会员。凡是有人介绍要求入盟的，由我以主盟人的名义，写张条子承认他是会员就是了，不用经过发证书和别的手续”。党内成份复杂，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严重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

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宋教仁，热衷于政党政治。他主张以同盟会为基础，另组新党大党，建立政党内阁。他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1912年8月，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的同意下，以同盟会为基础，与由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组建为国民党。领导体制由同盟会的总理制改为理事会议制，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8人为理事，但实际上整个党务由宋

教仁代理。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7人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被列为党员和干事。国民党本部设在北京，各省和海外各埠设立支部，国内各交通口岸设立交通部。党员人数众多，在临时参议院内占有多数席位，成为第一大党，完全变成了一个庞杂而松散的政治团体。因为它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提倡的“男女平等”的进步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这便失去了积极斗争的意义。虽“民国政党，唯我独大”，但很难再发挥战斗作用。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便竭尽全力去实施政党政治方案。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沉浸在国民党在国会选举所取得的胜利中，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将他杀害。

宋教仁殷红的鲜血，洗亮了国民党人朦胧的眼睛。孙中山从血的教训中猛醒过来，举兵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被袁通缉，再次逃亡到日本。

唤起党魂 重组新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的思想是极其混乱的。亡命到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谮。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但孙中山以百折不回之志，愈战愈奋，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备，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到会者有8省逃亡到日本的

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有300多人参加。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任命陈其美、居正、许崇智、胡汉民分别为总务、党务、军务、政治各部部长。孙中山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把革命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并规定按入党时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在起义以后到宪法颁布的时期内，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

鉴于“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华革命党采用党魁制。孙中山反复强调，“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使党降低到旧式会党的水平，影响了组织的发展。不少老同盟会员因不赞成誓词中的“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及按指印等做法而拒绝参加。大会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兴不加盟而虚位。这样，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人数寥寥的秘密团体，党员最多时只有500—600人。

由于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运动中，以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已基本上起不到政治作用，且当时在美国、南洋等地的党员，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活动，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昔日老党员，也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奋斗。同时孙中山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

量，觉察到采用过去的斗争方式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必须重新整理党务，整顿组织，以改变党的状况。为此，孙中山在1919年断然将中华革命党解散，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为区别民国元年时期五党合并时的国民党，在“国民党”前加“中国”二字，以表示中国国民党是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

1919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8周年纪念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规约》总纲规定“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政纲”，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的政纲。改变了会党式的效忠个人的入党手续，“凡中华民国成年男女，与本党宗旨相同者，由党员二人介绍，并具愿书于本党，由本党发给证书，始得为本党党员。”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综揽党务。总部组织机构设总务、党务、财务三个部，并规定了各部职责、职员选举、任期会议制度，以及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本部设于上海，总理全党事务，设总支部、支部、分部于国内外。孙中山自任总理，10月13日委任居正、谢持、廖仲恺分别为总务、党务、财政各部主任。

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为实现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又开始了新的奋斗。